



任宇农

風雨南州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风雨南州

任宇农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一九八四·北京

风 雨 南 州

*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*

开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• 印张 4¹/₂ 字数 80,600
1981年 5月第1版 1981年 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 10309·21 定价 0.72元

序 一

魏维贤

新马华族文化的积极发展，到二十世纪开始时已经成为一件急不容缓的工作。理由很简单：华人到了这时期，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经济基础，生存可说没有问题。但是要在这一基础上再跨前一步，非有高一层的文化与教育修养作为辅导是不能达到目标的。何况许多华人已经在此建立家庭，子女们更需要教育的栽培，以便顶起再接再厉的重任。单靠原始的民族本性，如勤苦，耐劳，节俭，互助等来解决基本生存条件以外的新问题，恐怕难免有不足之嫌。从这角度来看，战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南渡，对促进新马华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功用，而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也值得大书特书。

当时中国政治的不稳定，以及经济与社会的破坏，迫使这些知识分子大量地到这里来另找出路。这一批的新移民，无形中为新马华人的拓荒者弥补了这方面人力需求的奇缺，使华人的社会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，获得起飞的机会。惟有政治意识的基本问题——中国中心或本地中心，何去何从——为他们自己所不能够满意地解决者外，其他问题（如民智的启发，社区的发展，工商业的现代化，教育的普及，大众传播系统的建立，等）都能够在这支

生力军的支持下获得解决，使华人社会欣欣向荣。

刚从中国到这人地生疏的地方，他们通常在报馆或学校服务。其实也只有这两块园地是当时文化人耕耘的地方。可是报馆职位有限，所以到头来还是在教育界做事者为最多。他们辛辛苦苦和安分守己地为同胞培育下一代，即使是穷乡僻壤，只要有华族子弟需要接受教育，他们都会挺身而去，不辞劳苦。尽管他们之间有良莠不齐的现象，但总的来说，他们确是深入民间，到处点燃教育的火炬。如果没有他们，华教哪能普遍？华人的知识水平哪会提高？

在这群文化人当中，任宇农先生虽然是后来——他是抗战时期才南渡——但仍不失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南来的知识分子。他到了檳城之后就从事出版编辑杂志的工作，宣扬抗战的精神，握着那锐利的笔杆，鼓舞民族的正气。日本占领时期，他过着艰苦的生活，幸而平安地度过难关。战后他投身教育界服务，直到退休时为止，没有离开过这神圣的岗位。这段时期的本地政治气氛、客观环境，与战前有很大不同。任先生经历了这么多的变化，相信心情难免有很多矛盾，很多感触，也许还可能有很多幻想！如果能够把这些不同时期的感受与观察记录下来，对我们今日的华人来说，是多么有意义，有价值的社会史料！很可惜的，任先生的早期作品大多数已经散失了。这四十年所写的文章，也只有这区区的三四十篇*，辑在此发表，而这些又多数是近作，不足以反映这近乎半世纪的文化人历史陈迹。这点我觉得惋惜：这点也是本书美中不足而又无从弥补的地方。

我认识任先生，算起来也有二十多年了。当时他给我

的印象是一位有才学的文人，性情直爽，喜欢品评人物，是值得我钦佩的前辈。跟他接触多了以后，又觉得他热情豪放，给人有一种怀才不遇之感。我们一有机会在一起时，总是高谈阔论，多么开心！这次他决定出书，叫我写序，明知自己不能胜任，但忝在知交，敢不遵命？随便写这小段，与其说是序文，不如把它当做我们友谊的纪念文字吧！

※ 本集选十七篇——编者

序 二

黄汀湘

任宇农先生决定把他四十年来写作的文章集印成书，据他说，是想借此作为人生的一个纪念。我知道他这个决定后，很为他感到高兴。

过去，我常有机会读到任先生的旧诗词，觉得他的律绝寓意深刻，用字洒脱自然。我尤其喜爱读他的词，不但词意新，词情美，而且词风飘逸，如行云野鹤，如风竹飞泉，耐人咀嚼回味。

最近，由于工作上的方便，我又阅读了他寄来的不少文章，有抒情散文，有短篇小说，有长篇言论，还有序跋书札，等等。他在字里行间既流露出锐利的笔锋和进步的思想，又洋溢着热忱与真挚的感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对事物的分析和评论往往有独特的见解，也往往透着一股凛然正气，很具说服力。可以说，从他的作品中，我看到了中国的典型知识分子的形象。

现在，任先生将其中四十来篇作品汇编出版，给本地文苑添植了一棵绿树。相信那浓密的枝叶一定会投下荫翳的树影的。

自序

写文章，想来是生活的纪实，也是思想感情的发抒，这说法大致不会错吧。在人生生活道路上，思想每每受激发，感情也就起升华。前人说过：“文章有因时而著，诗歌有因感而发。”魏曹丕曾对文章发挥过热烈的赞颂，他在《典论论文》里说：“文章乃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，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”他心目中的所谓“文章”，我想应该是与社会国家有关的文章，与人群生活不能分开的文章，才是不朽之盛事，才是经国之大业。换一句话说，唯有反映生活，反映社会，反映时代的作品，才是有生命的作品。易言之，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与社会人群的思想感情融和起来，这样的作品，自然蕴孕成为一种有生命之力的艺术，涵煦可爱的光！

我不是文学作者，也没有文学才分，写不出有分量的东西来。然而，几十年来，目所见，耳所闻，或者是不忍见，不忍闻的种种现象，很想借用文字写出来，给青少年学生看看什么是光明和正义，什么是绚美与坚贞，或者什么是阴暗与奸邪。所可惜的是，眼高手低，写不出象样的文章来。

青少年时期，我也曾亲历农村经济破产的实况，疮痍、疾苦、流亡等等悲凉现象，冲激我的心与思想。我也曾浸淫在半封建意识，半科学思潮，而又是以儒家哲学思想注

入的教育中。摸索了一段年月，似乎一无所得。一九三五到三六年期间，我在醴陵县立女子乡村师范教书。这个县，出过好些大军阀，这些军阀也曾经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起过一定程度的影响。而他们的故乡县份，地方势力嚣张，民间风气有若郑卫之风的情况。所谓新教育，新思想，根本无力与之抗衡。这情形，使得满怀壮志的知识青年苦闷。如果说苦闷是文学的象征，然而，文学的克星却不容许文学抬头！

一九三七年五月，我和周曼沙先生南渡来到了槟榔屿。这年七月七日，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侵略，中国展开了全民抗战。我与周曼沙、杨孟辉、许绍元、沈赤明诸先生在槟城创办南风社，出版《南风杂志》，宣扬中华民族的神圣抗战。一九四一年日本皇军南进，十二月，马来亚半岛沦陷了。三年八个月的恐怖日子里，初期，我踏着脚车做小贩，在烈日下，在风雨中，奔走市邑乡镇。稍后，我与夫人陈月莲女士租住太平市郊的一座椰园亚答屋，开始制作虾饼与肥皂发售。这段日子里，尝尽了辛苦，然而却也认识了劳动生活的意义，体验到战争带给人们的痛苦。痛苦的心田里似乎蕴积着文学情愫，但在日本皇军镇压之下，谁也不敢写什么东西，也没有可以发表的地方。

四十多年南州生活，风雨无情，年华老去，遥望天际云霞，不免惆怅。然而另一方面却使我有机会认识英殖民地教育的制度与内容，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目标。他们所推行的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那就是把不同民族同化！这层忧患，时时鞭策我们的背脊，锥刺我们的胸心。另一方面，那就是我们的本身，隐隐有着痼疽在腐蚀我们的健康，

在危害我们的生命。这情形，怎不令人寒心，怎不令人激动！因而我写过一些东西，在报章和刊物上发表，传达我的心声！

从教育生活中，我了解到一点，那就是：教育要给学生知识，要给学生思想，要给学生拓展新生命的勇气和毅力。同时，我要强调：个人不能愚昧，民族子孙不能愚昧。这应该是教育的崇高理想，也是我的生平理想。我是一位教育工作者，也不妨说是半个文化工作者，几十年来，我曾默默地耕耘播种，一心希望看到林木茂盛，看到花枝遒劲，看到麦秀稻肥。这些都是我的生平意愿，我曾就这一意愿写出我的意见，写出我的感情。然而，非常遗憾的是，这些东西似乎缺乏社会人群的思想感情。缺乏社会人群思想感情的东西，又怎能反映时代与社会呢？而且，所写的东西经过几十年生活的变动，大都散失了，保存下来的仅仅四十来篇。现在把它集成一个小册刊印出版，名之曰《风雨南州》，算作是我个人的生活纪念吧！

目 录

魏维贤教授序·····	(1)
黄汀湘先生序·····	(5)
自序·····	(7)
中学生要读有生命的白话文·····	(1)
我们只是在言论中挣扎·····	(15)
人性的善与恶·····	(23)
当前的教育课题·····	(27)
苦闷是人生的体验·····	(33)
忧患中见友情·····	(43)
历史是无情的镜子·····	(55)
浅谈第二语文教科书与教学法·····	(63)
各有千秋·····	(67)
现社会中的道德问题·····	(73)
一个养女的酸楚·····	(83)
慈母的悲哀·····	(89)
好心的儿子·····	(95)
答青年学生三个问题·····	(99)
一封没有文字的信·····	(111)
名马宝剑·····	(113)
往事几回回味·····	(117)

中学生要读有生命的白话文

学校是实施教育的中心，也是教人生活的起点。要如何才生活得有意义，如何才算是生活得有价值，这就要看所推行的教育是怎样的教育。如若推行的是人材教育，那自然是社会之福；如若推行的是奴才教育，那就无异为新的一代预先写下讣文。马来西亚的华裔公民，在生活的道路上，在漫长的年月里，不知付出过多少血汗的代价，经历过多少苦雨凄风。我们的前人经得起惊涛骇浪的冲激，更有着坚忍刚强的意志，总要为子孙撑持出一个局面来，总希望子孙不愚昧，不卑怯，于是集合群体的力量来创办学校，使子孙有受教育的机会，通过教育的陶化，激发他们的志气，启发他们的思想，蕴孕他们的感情，培育他们的人格，增益他们的知识学问技能，使他们都能勇敢的挺立起来肩负起做人的责任。这是前人的办学苦衷，昭昭在目。今天，我们华裔公民所建立的学校处处林立，虽说是适应时代需求而建立起来，但水有源木有本，我们是应该记取前人开创启发之元功的！

华裔公民所建立的学校，不论是小学中学，其学制仍然是承袭中国五六十年前的旧学制。不管这种学制合理不合理，违悖时代趋势与否，我们的办学人员仍然是“承袭”不误，没有改革，也不思改革，更没有勇气改革。而执政当局也是采取“放任”的态度，只要你们不“越轨”，也就

不为已甚。怪只怪我们自己没有睁开眼看看社会是怎样在变，我们却从来没有勇气在自己的心头上重重的击出火花来，让火花的光照见四面八方的道路。好些人更是在陈旧的轨迹圈子里沾沾自喜，大言炫耀。一个民族语文学校，如果只是消极的因循承袭性质，而不肯积极的从学制上，内容上，方法上，学科上，设备上谋改进，求充实，配合时代需要，那这种教育方式无异是固步自封，固步自封的后果，是会永远被抛在时代的后面。教育就是生活，就是改进，就是推动社会，指导人们的崇高原则，依此而言，我们的办学人员难道就没有愧疚吗？今天的时代，是一个极其艰巨的时代，我们总该要有打从内心的觉醒，如何设法来改革弊端，纠正错误，谋学校革新的建设，提高学生的程度，进而建立“教育精神防线”，才是自力更生之道。

中学生的华文程度问题

办学校的人，学生家长，以及社会人士对于中学生的华文程度这一问题，都有同一的看法，那就是中学生的华文程度的低落，低落到令人吃惊。中学生的华文程度，究竟要怎样的一个水平才是合格？要采取怎样的办法才能使达到合格的水平？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，也是今天华文中学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。中学生的华文程度所牵连的范围十分之广，它涉及到：教育政策，学校课程编制，华文课本，教学时间，教师的文学修养，学生的学习心理与学习精神，学习环境，考试制度等等方面。

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政策，在这里我不想谈论。现在先来谈谈学校课程编制。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不论

中学小学，原本是我们华裔公民数十年来出钱出力惨淡经营教育人材的园地。自从一九五七年度起，华文中学先后接受了政府的建议，改制为“国民型华文中学”，置于政府全盘管理之下。没有接受改制的学校，仍然是独立中学，仍然是自力惨淡经营。一样的是为国储材，替政府分担了教育责任，却从不“得意忘形”有所希冀！

国民型华文中学的课程编制，即是每一周每一学科授课时间，是由教育部明令规定的，他们的各个年级的学科，从初中一到高中三，国语是四节，华文是七节（有的甚至只排三节或四节）。英文是九节（初一则是十四节），其他如：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自然、历史、地理等科目，全是采用英文课本。那即是说，每周上课四十节（初中一、初中二则是三十五节），除开华文七节外，全是以英文教学。这样的课程编制，这样的教学气氛，不是把学生的学习心理、学习兴趣、学习精神都明显地导向“英文化的领域”吗？再加上“华文”在各种考试制度里的“附庸”地位，学生的读书重点与学习目标倾向于“英文学科”方面，这是极其自然的现象，也是不好苛责他们的。既然如此，希望他们的“华文程度”进步，或是提高到某一水平，有可能吗？光是口头上喊要提高学生的华文程度，而实际行动则是以“英文”为本位，又唯恐不能与英校并驾齐驱，这样的“华文中学”若想要提高学生的“华文程度”，那岂不是缘木求鱼吗？

一九五三年，我新到某中学任教，学年头一次华文科会议，校长列席发言，提到学生的“华文程度”，看他的态度，听他的语气，对于学生华文程度的低落感到失望，遗

憾，慨喟，一副有心人的气慨。他讲了话之后，坚持要我这位新上任的华文教师讲话，提出意见。我在连催带请带劝的情形下，只好起来讲话。记得当时我讲话的大意包括三点：一，华文中学学生的华文程度应该特别予以注重，予以提高，首先要明确地订立这个原则；二，要提高学生的华文程度，必须先激发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和学习心理，建立华文精神防线；三，如必欲达到第二目标，那就得先把学校的“课程制度”予以适当的修改，对华文节数作合理的增加，订立“华文奖励条例”，树立正确的浓厚的华文风气，以与“华文中学”这一块金字招牌相表彰。我说了之后，还作了一个附带声明：“刚才我所说的，只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不是作意见提出。”我刚一坐下来，某校长面容泛赤泛白，迫不及待地说：“现在的课程制度，是我们××中学的传统，要想修改它，除非毛泽东的军队来到这里，否则是绝不可能的。”他这位仁兄的话，顿使出席会议的华文教师感到愕然，瞠目结舌，大家只好默默地散会。到了今天，事隔二十多年，时移势易，毛泽东的军队并没有来，相信也不会来，但是，毛泽东的外交代表却是来了，两国建立了相互尊重的邦交，这未免给那位仁兄一个“惊梦”！

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六日，我在南洋商报的星期论专栏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当前教育课题》，我引用一段如下：“我们平日似乎都有同样的感觉，就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文盲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严重。文盲，一般的解释是‘不认识字的人’，或者是‘没有受过教育的人’。这种单纯的解释，只是从教育的角度去认识文盲，如果把这个问题的偏限于教育圈子之内，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只有用教

育的力量，教育的方法，教育的材料。教育的方法与材料，在科学不发达的国家里，只有文字与书本，于是扫盲的武器惟有赖乎文字与书本了，至于教育的力量也只有希望它从文字与书本里产生了。假如不幸，一间推行教育中心学校的主持人，对于文字与书本的选择患上了‘后天文盲’之症，那所产生的后果，真是不堪想象！”

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，我在南洋商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学生学习心理与教育精神防线》，其中有一段写着：“谈到提高华文水平这一课题，自然就要设法改变学生学习心理，要改变学生学习心理，自然就要针对课程时间的分配，课本的内容，学校教学方针、设备、指导、鼓励等方面，须符合华文中学的宗旨，根据华文教育原理、华文教育原则，配合时代趋势、地理环境、社会环境去办理，去实施，去改进。不可否认，目前有些华文中学的学生对于中文似乎有意无意地存着轻视心理，或者引不起兴趣，然而，他们的中文程度呢？除了极少数的天才学生或者是有志于中文的学生外，大多数不到水平，这一问题牵涉到学校的教育方针、课程时间、课本内容、环境、学校设备，以及教师的文学修养和责任感等等方面。”

需要读古文吗

目前马来西亚的华文中学有两种：一种是国民型中学，属于政府学校；一种是独立中学，属于华裔公民所兴办。国民型华文中学的华文节数，有的每周七节，有的每周五节，有的每周只有四节或三节；独立中学如韩江中学的华文节数是每周九节，还有两节历史也是中文本，合起来是

每周十一节。在多元文化社会里，这样的课程编制还算适中。

国民型中学也好，独立中学也好，每周的华文节数呈现出一个显明的对照，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。但是，还有比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问题，就是“华文课本”的问题，就是学习读“古文”的问题。今天所有的华文中学，他们所采用的“中学华文”课本，课本里面的文章，除了一部分课文是采自现代新文艺作家的作品之外，其他全是采自“古文”，从初中一至高中三，“古文”比例是依年级递增。出版商和他们的编辑人员编辑的“中学华文”是怎样的一个原则呢？我们的中学教育领路人所采用的“中学华文”又是怎样的宗旨呢？一、是要以“古文”来修养中学生的华文程度，二、是要中学生研究“古文”；三、是要以“古文”来激励中学生的思想志气；四、是要以“古诗赋词曲”来陶冶中学生的情感。

先谈“以古文来修养中学生的华文程度”。这一个问题，我们不妨平心静气地看看，华文中学的学生在六年的中学教育里，读了一百四五十篇的“古文”和“古诗赋词曲”，他们的华文程度到底提高了多少呢？他们能不能够运用纯熟的文言文笔调写出自己的生活情况？写出人群的动态？写出社会的实况？“古文”的维护者或者说，中学华文课本里的“古文”是要促进学生对“古文”阅读欣赏的能力与兴趣，而不是训练他们学习写作“文言文”的技巧。那么我要请问，中国的“古文”都是字简意赅，诘屈聱牙，阅读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何况是欣赏！就拿庄子的文章来说，他使用丰富的字汇，倒装重叠的句法，奇怪的字眼，巧妙的寓言，来表达他超人的想象，浪漫的感情，象这样